

“床头放菜刀的女孩”想成为的人

——记安岳县建华九年制学校教师蒋贤芳

本报记者 何元凯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爱的组诗

■ 重庆市两江新区实验中学校 沈萍

班主任工作第二年,我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一句话:“教育是一场暗恋,拼尽全力爱一群人,最后可能只感动了自己。”如今回想起来,那点苦涩实在幼稚。

那年立夏,我在超市采购日用品,和母亲走在回家路上,手里提着大包小裹,步子走得匆忙。转过街角时,两道身影突然从路边窜出来,差点和我们撞个满怀。定睛一看,是班上两个男孩——小齐和柯柯。

“老师,我们来帮您提东西!”两人笑得咧开了嘴,不由分说地接过我手里的购物袋。我愣住了,明明记得小齐家住学校附近,和这儿完全是反方向。“你们怎么在这儿?”“我们坐公交车路过,远远地看见您了,就提前一站下车等您。”我算了算,从这里步行回他家,少说要20分钟。这孩子平时在班里懒散散,作业时常常拖欠,为此我很少找他谈话。可此刻,他拎着沉甸甸的袋子,走得飞快。

母亲在一旁小声感叹:“你的学生真懂事。”我只觉得胸腔里有什么东西软软地塌陷下去,又暖融融地胀开来。

那一路,两个少年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,班里谁又闯了祸,哪科作业留得太多,数学老师今天穿了件新衬衫——全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。晚风裹着初夏青草的气息,吹得人心头发软。

回到班里,我什么都没说,但看小齐的眼神变了。他再迟到时,我压住了嘴边那套关于“时间管理”的说辞,只是问了句“昨晚睡得好吗”。他愣了一下,挠挠头,后来,他迟到的次数竟慢慢少了。也许有些改变,并不需要大张旗鼓地灌输道理。

自那以后,我开始格外留意那些琐碎的、不在计划内的时刻。

早自习下课,妍妍怯生生地走到讲台前,伸开掌心,3颗水果糖安静地躺着。“老师,您一上午都在说话,吃颗糖,嗓子会好受点。”她说完就跑,马尾辫在身后甩来甩去。那3颗糖被我搞了一天,舍不得吃。苏霍姆林斯基说:“教育技巧的全部奥秘,就在于如何爱护儿童。”可那一刻,分明是学生在爱护我。

还有阿灿。这孩子在家里跟父母拧得很,动不动就摔门,家长会时,她妈妈坐在我面前掉眼泪。可每天清晨,我走进办公室,暖水瓶里永远是刚烧好的水。无论寒暑,她总是第一个到校,推开门,插上电,等水开咕嘟咕嘟冒热气。我捧着红糖水暖手,隔着氤氲的白雾看她坐在角落背单词的背影,心想:这孩子心里有火苗,其实一直亮着,只是家里没看见,学校若再看不见,怕就要灭了。

端午节前,茜茜的妈妈送来一箱鲜花饼,全班孩子每人分一块,多出两块。我让学生鼓掌感谢之后,端着托盘问:“多出来的两块,谁想要?”小手举了一片。我又问:“拿到饼的时候,心里什么感觉?”“甜!”“想吃!”“开心!”孩子们答得热闹。

我又故意问了一句:“这是茜茜妈妈对大家的爱。可平日里每天陪在你们身边的,还有谁呢?”

教室里安静了一瞬。然后不知谁喊了一句:“给老师!”孩子们呼啦啦站起来,把自己的那块也拿了出来。“我给语文老师送去!”“数学老师还没吃早饭呢!”小小的身影四散跑开,像撒出去的糖豆。

鲜花饼的酥皮簌簌地往下掉,馅儿甜得有点腻。可看着孩子们跑远的背影,我觉得那是我吃过的最好的点心。

日复一日,这些琐碎的片段像针线,密密缝进班级管理的日常。我不再执著于开一次轰动的感恩班会,或是写一份漂亮的活动策划。更多时候,我只是在阿灿烧水时拍拍她的肩膀,在妍妍递糖时给她一个热情的拥抱,在小齐偶尔迟到时递个理解的眼神。

暑假,整理班级相册,我翻到一张运动会抓拍:小齐跑完800米瘫在草地上,旁边围了四五个递水的同学;阿灿举着班牌站在队伍最前面,笑得露出虎牙……照片里没有我,但每一张笑脸都让我想起那些糖果、热水和黄昏里的脚步声。

我合上电脑,窗外暮色正好。忽然明白,从教之初日记本上那句“只感动了自己”的感慨,实在错得离谱。怎么会是单向的付出?明明是这群孩子用他们笨拙而真挚的方式,先治愈了我。

师爱若能成诗,写下第一行的那个人,从来都不是教师。

(文中学生均为化名)

这个夏天,安岳县建华九年制学校教师蒋贤芳收到一条喜讯:曾经的学生张箏,以物理类598分的成绩考上四川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。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,18岁的张箏说:“我要像妈妈牵我一样,去牵更多孩子的手。”

在众多报道中,张箏被称为“小时候床头放菜刀的女孩”,她口中的“妈妈”就是蒋贤芳,两人并无血缘关系,将她们俩的人生牵在一起的那根线,是一个乡村教师对学生发自本心的责任感和爱。

而在蒋贤芳29年的教育生涯中,像张箏一样,被她照亮的学生还有很多。

“要不要跟我回家?”

2018年,蒋贤芳注意到了班上那个总是九十度鞠躬向老师问好的女孩——张箏。“这孩子太安静了,眼神里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忧郁。”从教多年,蒋贤芳一眼就看出来:“这个娃吃了太多苦。”

从班主任那里,她了解到张箏的身世:父亲、爷爷接连离世,母亲也离开了家,年幼的女孩陷入极大困境。夜里害怕,张箏就在床头放一把菜刀;年弱力小,她的衣服总是洗不干净,磨得发亮,被同学嘲笑;每逢家长会,女孩只能独自坐在角落。虽然有各方接济,让她得以维持生活和学业,但一个不到10岁的女孩如此孤独,真能健康成长吗?

蒋贤芳的心被揪紧了。每当夜深人

静,看着自己的女儿酣然睡在身边,她更加牵挂张箏。她觉得,应该为那个孩子做点什么。

一天,蒋贤芳问张箏:“要不要跟我回家?”

就这样,她牵着张箏的手回了自己家。因为缺乏照顾,张箏严重营养不良,个子比同龄人矮一大截,还患有鼻窦炎、贫血等病。暑假里,蒋贤芳每天陪她输液、换药,饮食方面更加注重营养搭配。在她精心照料下,张箏的健康状况明显好转,脸色逐渐变得红润。蒋贤芳的丈夫和女儿都把张箏当成新的家庭成员,友善对待。“小女儿”逐渐融入了这个家庭,性格明显比以前开朗了。

不止一个“张箏”

在乡村学校教书多年,蒋贤芳遇到的“张箏”不止一个。

每天到学校,蒋贤芳会习惯性地察言观色,揣摩孩子们的心理:脸色不好看的、表现得比较难受的,她就会主动把原因调查清楚;有心结的,就多多跟他“摆谈”;生活遇到困难的,就想方设法帮助。

一个孩子从小就没有妈妈,奶奶也在她一年级时去世。爸爸和爷爷照顾不周,孩子蓬头垢面地上学,头发长到遮住鼻子。蒋贤芳主动给她剪头发、帮她梳头,经常给她温暖的拥抱。孩子渐渐变得阳光起来,越发懂事——爸爸不争气,她还要在

爸爸和爷爷之间调解。

一个孩子父母离异,妈妈在云南务工,孩子随父亲在安岳生活。蒋贤芳给了孩子加倍关怀,主动告知她妈妈孩子在校的优秀表现。孩子妈妈想把她接到云南,但孩子很有主见,选择留在建华九年制学校读书,最重要的原因是“舍不得蒋老师”。今年中考,这个孩子的成绩被屏蔽——意味着她在全县名列前茅。她妈妈发来消息:“蒋老师,这个女儿有一半是你的。”

还有一个从云南转学回来的孩子,父母时常体罚,导致孩子愈发叛逆,学习成绩不好。蒋贤芳没有对孩子另眼相待,

健康快乐第一

这些年,张箏经常在体育竞赛中获奖,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,中考考了镇上第一名,高中阶段成绩虽有所下滑,但蒋贤芳从不施压,她对张箏的要求是:“健康快乐第一,成绩第二。”

这句话,她不仅对张箏说,也对所有学生说。

有一次,班上一个孩子看到蒋贤芳当天不怎么高兴,就指责另一名受到蒋贤芳很多帮助的同学:“肯定是因为你这次又考得不好。”听到这句话,蒋贤芳把两个孩

子叫过来,说:“老师有时候是忙累了,脸色就不那么好好看。我绝对不会因为谁考得不好而给谁脸色。”

身处乡村学校,留守儿童、单亲家庭孩子较多。“童年受的伤,有可能会用一生去弥补。”这句话蒋贤芳时时记在心上,也成了她教育观的底色。“缺爱的孩子,可能一辈子都在寻找爱,容易出现心理问题。因此,不能让他们的身心在学校再受伤害。身心健康第一,然后再谈成绩。”

蒋贤芳帮助困境儿童,有一套自己的

给缺爱的孩子多撑一把伞

其实,蒋贤芳的“来时路”,和张箏及其他受助的孩子类似,是被教育扭转了方向。

20世纪90年代的安岳乡村,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,邻居家孩子就挣了可观的钱。对比之下,读初三的蒋贤芳算了算家里的账,觉得继续读下去像是个奢望。她对母亲说:“不读了,我去打工。”

母亲不识字——外公当年只让舅舅读书,母亲一辈子吃够了没文化的苦。她对蒋贤芳说:“你等中考完再决定吧,就当妈妈晚生你半年,不着急的。”这句话,把

蒋贤芳留在了课堂。最终,蒋贤芳考上了师范学校,两户邻居又主动借钱帮助,让她得以顺利完成学业。

“所以,我知道读书有多重要,也知道被人拉一把是什么感觉。”蒋贤芳说。

因此,29年来,她一直在乡镇学校教书。乡村教育的一大难题是家庭教育的欠缺。“对于许多农村学生来讲,这一环太弱了!”蒋贤芳感慨。找家长沟通孩子的问题,有的爷爷奶奶直接说“孩子我不要了”;有的把“皮球”踢回来,“老师,他只听

装裱在相框里的纸条

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兼庄乡中心校 李亚鹏

某天夜里,小宇发来一条微信消息,问我:“李老师,下学期您不教我们了吗?”在得知我下学期要返回原学校任教后,小宇发来一个“哭泣”的表情图,接着写道:“李老师,您知道吗?您开学写给我的纸条,我让妈妈装裱在相框里,摆到书桌上,每天看一遍。因为这张纸条,我现在更自信了,成绩也更稳了!”

纸条?我有写过吗?我在脑海中飞速搜索着记忆。小宇又发来一条微信,“当时我正因为听不懂数学而焦虑烦躁,您给我的纸条上写着‘不必焦虑眼前得失,脚踏实地,前路自有繁花盛开’。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力量。”

尘封的记忆被唤醒了。那是一年前,我被交流到这所乡镇中心校任教数学。初次来到乡镇支教交流,我的内心是极不情愿的。长达一小时的通勤路程,

数学基础薄弱的学生,忙于生计、无暇配合老师的家长,以及陌生的职场环境,都让我对这次支教充满了忐忑与无奈。

记得是开学第二周,学校德育处开展了“一纸寄语”德育活动,要求各科老师自主选择几名同学,为其撰写暖心评语。开学之初,繁杂琐碎的事务让我忙得焦头烂额。出于“应付”的想法,我随意挑选了几名学生,用AI随机生成了几段评语,抄在纸条上送给了小宇他们。

想到这里,我的心中涌起一股深深的愧疚,这孩子知道真相后会多难过啊!我又想起,小宇的班主任非常重视这项活动,她对着花名册认真挑选学生,找科任老师共同分析他们的脾气性格,反复打磨评语。与她相比,我的工作态度无疑是合格的。

其实,在之后的日子里,我渐渐喜

欢上了这里,工作态度发生了极大转变。学生虽然数学基础薄弱,但学习数学的“鬼点子”着实不少。比如,学习长方形面积,有人提议一起去田间地头数田格子,加深对面积单位的理解;学习植树问题,有人发现可以用学校门前的行道树作为示例;学习倍数关系,有人专程从家中搬来一袋玉米棒,作为我的教学用具……更令我感动的是同事们对我的关心与关爱。天气骤冷,有同事特地送我自家自制的防裂梨膏;突然刮大风,好几位同事在微信群提醒我回家注意安全;晚上加班备课,学校跳闸断电,住在学校附近的同事特意送来手电筒……

扪心自问,我真的是因为事务繁杂而敷衍完成德育处的活动吗?不是的,本质上是我思想上的松懈大意——一年后我注定要离开这所学校,何必下力

气完成教学以外的任务呢?

万幸,在同事们的关怀下,在孩子们信赖下,我逐渐适应了学校的工作节奏,端正了工作态度。在我任教的一年里,孩子们的数学成绩取得了长足进步。

那晚的聊天最后,我请求小宇将装裱在相框里的纸条拍照发给我。看着这张被小宇郑重装裱起来的纸条,我暗暗提醒自己:一日为师,便要尽一日之责。

离校前一周,我向学校申请再次留校任教一年。因为小宇的班级即将升入六年级,临时撤换数学老师会影响孩子们的学习状态。

即将开学,我已经开始想念教室里可爱的孩子们。那张被装裱进相框的纸条,已经成为我教育生涯里的珍贵印记,时刻鞭策我用心对待每一件事,在乡村教育这一方沃土上勤恳地耕耘。